

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 以我國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為例^{*}

鄭宏文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1991、2001 及 2011 年對台灣地區大學生的調查中，發現 1991 年的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顯著高於 2001、2011 年的大學生，且政治社會化媒介在不同調查年間具顯著變化，1991 年政治社會化媒介以大眾傳播媒體對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最具影響力，其次則為學校。2001 年及 2011 年則以學校最具影響力。此外，在個人背景上，1991 年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因性別、父親政黨傾向等，而有顯著的差異。2001 年及 2011 年則為：父親的教育程度。

除了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外，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明顯下降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政治民主化改革之下，各種要求大致落實，也有了兩次政黨輪替，民主價值已獲共識，政治上關注焦點也由民主價值轉移至各項公共政策所致。

關鍵詞：民主價值取向、政治社會化、政治態度

* 本論文所使用資料，2011 年為作者針對台灣東北部某大學大學生進行的調查，1991 及 2001 則採自「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計畫編號：NSC80-0301-H004-18，計畫主持人為：陳義彥，其它研究參與者為：洪永泰、盛杏媛。「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NSC 89-2414-H-004-048)，計畫主持人為：陳義彥，其他研究參與者為：劉義周、盛杏媛、游清鑫、陳陸輝、鄭夙芬、張卿卿、洪永泰、鄧毓浩、傅恆德、陳文俊，兩項資料釋出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The Influence of Agen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n Political Attitudes---A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s

Hung-Wen Cheng

Ph.D. Candidate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On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 in 1991, 2001, and 2011,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s in 1991 were more supportive than those in 2001 and 2011, and the agen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ha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ose three years. In 1991, among agen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s on college students were the mass media, followed by the school. In 2001 and 2011, the school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Moreover, in 1991,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 were gender, and fathers' political affiliation while in 2001 and 2011,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were fathers' education .

Besides the influence of agen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weake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s.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s, most requests have been realized. In the meantime, Taiwan has undergone party alternations twice and consensus on democratic values has been reached. Political focuses have therefore been shifted from democratic values to varied public policies.

Keywords: democratic value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litical attitudes

壹、前言

一個國家之內的政治文化通常有其穩定性與持續性，即使有變化，亦應有一定軌跡可循，換句話說，政治文化對政治體系的穩定性扮演重要的角色 (Almond & Verba, 1963)。然而，不管穩定或變化，政治文化的各種內容，從對政治系統的認知、政治態度的形成到政治行為的展現，這些政治文化的實際內容，無疑都需要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來型塑。

台灣在 1949 年起，在政治上為了擴大民意的基礎並顧及本省籍精英份子的政治參與，各項中央民意代表有了增、補選，到了 1992 年更有全面改選之舉，總統的選舉更由間接選舉改為 1 全民直選。兩岸關係則由封鎖而開放，敵對的氣氛在相當程度上急遽的降低，兩岸也有了更頻繁的正式與非正式溝通。從民眾到對岸探親，進一步開放對大陸的投資。在政黨方面，開放黨禁，促成了政黨林立，民進黨也在此時成立，並成為主要政黨之一，公元兩千年更拿下了執政權，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2008 年更有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而這正是新興民主國家達成民主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 Gasiorowski & Power, 1998)。

在社會方面，1988 年解除報禁，電視頻道的開放，而從 94 學年度開始，中學髮禁徹底解除；經濟不斷成長的同時，出生率卻逐年下降；而隨著電腦等科技的不斷發展，電腦的使用開始普及，伴隨網際網路的發達，以及呼叫器、手機等通訊工具的使用，人與人的互動，有了更多的介面。而因為環境保護、經貿關係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化現象，使得全球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一個整體，人類在以全球為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有了更緊密的互相依存。

在經濟方面，從早期以農業為主的小農經濟型態，逐漸轉變為出口加工區的工業生產，除了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之外，家庭即工廠的狀況，更可說明此一期間的轉變。伴隨著科技產業的發展，出口加工區的產值，早已被科學園區所取代，並造就了一批「科技新貴」。這三個不同的時期，使台灣經濟成長，大部分時間維持在 5-10% 的經濟成長率，也讓國民生產毛額不斷的提升，幾乎可列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因此，可以說每個家庭都受到了經濟發展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台灣在政治、社會上的種種變革，大致上則呈現由權威邁向民主，由一元而多元，這些轉變除了來自於因應民主化潮流的趨勢之外，另一方面則是呼應了民間社會的需求。這些政治環境因素的改變，無疑是一種政治文化的變遷，其中，政黨的輪替尤其是明顯且重要的一項指標。政治文化各面向的變遷過程中，形塑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化媒介，起了何種作用？對各種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是否亦因此有

所不同？這些內容都需進一步詳加分析，才能釐清各個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

由於大專院校設立解禁、高等教育普及，使受過大專以上教育人口節節升高，從 80 學年度的 253,462 人到 91 學年度的 770,915 人。再相較於出生率的下降與人口老化，這群人於整個社會人口結構中，所佔比例更加提高¹。這種現象的發生，反應在歷次年輕且高學歷者投票者行為受到重視，更令人在研究台灣政治文化時，不得不特別重視他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在接受大學教育的同時，這批學生的年齡大抵正值由青少年轉變為成人，部分脫離家庭生活，活動的場域也大半集中於學校，換句話說，所有主要的政治社會化媒介的薰陶，在此時都進入一個比較完整，或者接近完成的狀態，在此時，人格越趨於成熟，政治的態度與行為傾向也接近穩定，因此，就此時所做的調查結果，幾乎可以拿來預測其未來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傾向。

面對政治系統的巨大轉變，世代之間的政治態度是否就此產生變化？尤其自 1990 年到 2000 年間台灣的民主轉型、2000 年之後民主的深化，作為實施民主制度基石的民主價值取向，在不同時代大學生的身上，是否有所變化？如果真有變化，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形成的影響，是否因年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力？以上這些議題正是興起此研究的主要背景。

貳、民主價值取向

一國之中，人民所俱有之民主價值取向對於民主化的重要性，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肯定，因為，民主的政治文化，有利於民主化的形成。然而，民主價值的實際內涵，因研究者著重的角度不同，而有差異。一般而言，民主價值取向所指稱的是一個民主政體下體系成員在角色權力的規範上所持有的信念（胡佛，1998：75-108）。學者就所著重的重點不同，提出各種衡量民主的指標。R. A. Dahl 即提出八個民主指標，（1）投票權利，（2）被選舉權利，（3）政治領導人爭取支持及投票的競爭權利，（4）選舉的自由及公平性，（5）結社自由，（6）表意自由，（7）可選擇的資訊來源，（8）依投票及其他偏好意志，來制定公共政策的機制（Dahl, 1971：3）。Dahl 所著重的多元主義民主之指標，所著重者是公民權利及公民政治參與兩大面向。Sorensen 則指稱政治民主即為參與、競爭、以及公民自由與政治自由（Sorensen, 1998：15）。

¹ 大專以上學歷佔 15 歲以上人口數比例，從 86 年的 8%，到 92 年時，為 30.02%。大學以上學歷佔 15 歲以上人口數，則由 86 年的 7.51%，增為 92 年的 15.9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03.16，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408&CtNode=4594>。

J. W. Prothro & C. M. Grigg 則從肯定民主的角度出發，提出三項最重要的民主價值原則，而其中包括五項陳述：(1) 民主政治本身的原則：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體。(2) 多數統治的原則：A. 公務員應由多數票決產生。B. 每個公民應有同等的機會來影響政府的政策。(3) 少數人權利的原則：A. 意見不同的少數人應可自由的批評多數人的決定。B. 意見不同的少數人應可自由的設法贏得多數人來支持他們的意見 (Prothro & Grigg, 1960: 282)。

純就字義上來說，民主 (Democracy) 一字乃是由希臘字 demos (the people) 與 kratos (rule) 二字合併而成的，其原意為人民統治 (何信全, 1988: 24)。陳義彥就認為，民主政治系統要能持續，必須每個人存有下列兩種共識：實行民主政治系統的願望，以及對某些抽象的原則，如像「人生而平等」，具有共識之感 (陳義彥, 1979: 69)。

胡佛等亦指出，政治體系運作的權力規範，依權力關係的性質，可以分為以下數類：(1) 所據的權力地位：即成員相互之間，於系統運作上，所處的權力地位，這就是構成平等與否的關係。亦是平等權行使的規範。(2) 政治權力的來源：即整體系統與決策層級所掌握的權力係來自何處。這是主權在民與否的關係，也構成參政權行使的規範。(3) 統治權的範圍：即整體系統，尤其是決策層級所行使的統治權力是否具有範圍。這一範圍是相對於人民及社團的權力，所以在權力關係上可以在劃分為二：A、人民自由權的保障：即對成員的統治權是否需受到限制，不能超越一定的範圍，而這便構成自由權行使的規範。B、社團自由權的保障：對其他社團的統治權是否需受到限制，不能超越一定的範圍，這可稱為社團的自由權，亦構成了多元權行使的規範。(4) 統治權的制衡：即決策層級自身所掌的權力，是否應按權能的性質，加以分立制衡，還是集中行使，這是分權與否的關係，亦是分權行使的規範 (胡佛、陳德禹與朱志宏, 1978: 14)。而以上四類基本權力關係所構成的五項權力規範，實際上即是民主的主要內涵，亦即是民主價值之所在。

學者對於民主所下的不同定義，評判一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標準也就不同。D. Beetham 特別著重政府的運作功能及全球民主共和國體的發展，並明確指出 14 項民主要件，大體可歸入四個面向 (Beetham, 2007: 182)：(1) 公民權利、(2) 代議及責任政府、(3) 公民社會及大眾參與、(4) 國家的民主。而其所採用的評鑑民主指標，依其媒介價值，主要有 7 大類，參與、權威性、代議性、責任性、透明性、回應性及共同體性 (Beetham, Bracking, Kearton & Weir, 2000: 14)，其指標由抽象而具體，各項目各有其所設計的要件及實際的制度化工具，結構可說相當完備。

經濟學人雜誌所提出的民主化指標，則採取五大項目，共 60 道題目。其項目為：(1) 選舉過程及多元主義。(2) 政府功能。(3) 政治參與。(4) 政治文化。(5)

公民權利(見 <http://a330.g.akamai.net/7/330/25828/20081021195552/graphics.eiu.com/PDF/Democracy%20Index%202008.pdf>)。依此五項重要的民主價值，將世界各國依不同民主程度分成完全民主、瑕疵(flawed)民主、混合政體及威權政體等四類。2008年台灣在該項調查排名33，屬於瑕疵民主，但相當接近完全民主。

政治系統維持穩定的因素之一，就是政治體制下的執政者，都會有意無意的塑造符合其利益的政治文化，並促使其人民能夠認同，以維持執政的可能。臺灣的情況亦是如此。但是，「政治社會化若要符合民主的理念，那麼給予學習者的是一種為平凡生活的設計，而不是期求偉大或偉人那種不切實際，且單一的對政治人物的認同(陳伯璋，1988：21)。」在這一段期間裡，許許多多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設計，雖然存在於臺灣社會裡，但是，卻也藉著權威性的方式，灌輸人們一些民主的信念。

在1991至2001年間，政治社會的巨大轉變，由威權轉向民主，2008年又有第二次政黨輪替，此過程中，大學生屬於社會中堅，其所擁有的民主價值，理應與政治局勢一樣，在不同年代間，有著顯著的差異。這是本文的第一個假設。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大學生民主價值變化的方向，應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具有逐步升高的趨勢。此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由於影響民主化的主要因素有：政治文化、公民社會、憲政體制、政黨與選舉制度、軍人角色、經濟發展、政府的管理能力等(郭承天，2004：140-155)。盱衡台灣的民主化轉型，基本的民主價值觀確立後，自由權的爭取、權力間的制衡都會是民主的基本要求，而最主要的訴求則是落實到最容易說明也最具體的反權威。因此，本文民主價值取向的測量，採用4個面向：反權威、民主基本觀、自由權與制衡權。此係採用陳義彥教授參考國內外學者與其前期的研究所擬出的15道題目，測量民主價值取向之題目，請參閱附錄。

參、政治社會化媒介

政治社會化是一種政治價值觀、態度與行為的形成過程，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化重要的因素，而民主態度的形成則有賴於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的作用。一般而言，在新興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豐富的民主經驗應有助於提高民眾贊同民主價值，而這亦屬於政治社會化作用的一環。

R.Dawson & K.Prewitt以間接與直接政治社會化，說明政治學習的基本過程(Dawson & Prewitt,1977)。間接的政治社會化指個人非政治性的學習，但實際影響其政治態度等的發展。一般而言，間接政治社會化的模式適於用來研究權威模式和個人參與的政治定向，但對於個人獲致國家忠誠感、政黨認同或政治立

場，則無法有效說明。如果以類型區分，也可以分為「有意的學習」與「無意的學習」；前者又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後者也可分成政治相關的及社會價值的學習（Sigel,1965：4-6）。雖然，兩者的性質不同，不過這二種不同類型的政治學習，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之獲取，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

民眾的民主價值態度變遷，計有世代差異、生命週期與制度學習等三種理論，目前則以 Mishler & Rose (2007) 集合該三項理論所提出的終身學習 (lifetime learning) 理論為最完整。Mishler & Rose 兩人整合過去的理论，認為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價值的變遷，透過這些因素都能夠獲得解釋。換句話說，儘管就各種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形成，有這些「遠因」與「近因」說之爭論，但不管何種類型的政治學習或者學習方式，事實上是同時存在，並且遍及於一生，只是影響力各不相同。張祐宗的一項研究顯示：制度因素可以解釋台灣民眾直接民主支持度的變遷，世代差異與生命週期可以解釋間接民主支持度的變遷，而選舉結果則同時影響這兩種民主支持度的變遷（張祐宗：2011）。

在大學生的生命歷程中，最主要接觸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大致有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S. Chaffee 就表示家庭幾乎是每個小孩子自出生後就分不開的社會機構（Chaffee, 1972:1）。H. H. Hyman 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家庭的影響力是最重要的（Hyman, 1959:69）。在家庭的環境中，雖然沒有正式的政治教育，但是，透過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存在著「模仿」與「間接的政治社會化」。親子間的關係、家庭中關於政治議題的討論頻率、父母親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傳遞了某些政治態度給小孩，而政治社會化也在這過程中進行。此外，家庭更是大多數人所接觸到的第一個政治社會化媒介。在家庭中，若個人接觸政治有關的訊息非常多，則可能會對個人政治行為與政治定向有所影響。因為在家庭中的時間較長，特別是在兒童時期，長期的薰陶之下，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更高，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家庭的政治化的高低所影響。因此，家庭的政治化意指：「在家庭中父母或家長對於政治感到興趣、並經常討論與參與政治活動的意思。」（Dawson, & Prewitt, 1977：144）

R. E. Lane 指出：父親運用直接灌輸、提供環境以及父子關係與認同等方式，型塑子女的政治信仰，而這過程便是「政治的孟德爾定律」（Lane, 1972:63），它說明了政治效忠與信仰之所以能夠代代相傳的道理。吳乃德 1999 年的研究也同樣得到證實，他發現新世代的選民，繼承了父親對特定政黨的認同。家庭這個最原初的社會單位，成為台灣民眾政治社會化最重要的場域之一（吳乃德，1999：53-85）。

在兒童時期這個階段，因為依賴，造成了兒童對許多事務的看法、解決事情的方法，與父母親或長輩有相當大的一致性。R. W. Wilson 就認為在此情況下，兒童將父母視為爭端的調解與問題的解決者（Wilson, 1970:59）。袁頌西也認為在

家庭裡：兒童服從家庭中的決定的模式，也可能對其未來成為公民時的表現有所影響（袁頌西，1969：25）。

袁頌西的研究更指出了家庭與政治社會化的關係：家庭政治化程度高者，子女政治功效意識亦高；都市家庭較鄉鎮家庭的政治化程度為高，並與其子女的政治功效意識成正相關；父母教育程度高，職業屬於白領階級以上者，家庭社會地位高者，家庭政治化的程度亦高（袁頌西，1974：1-12）。林嘉誠的研究則發現年齡與家庭政治社會化達顯著負相關，年齡愈低，家庭政治化程度愈高，家庭決策模式傾向民主化，管教方式傾向合理化。這代表因社會變遷，我國家庭的發展傾向民主與開明（林嘉誠，1987：237-271）。

大部分人的生命歷程中，在家庭的時間相當長，不過，家庭生活中，並非時時刻刻都在從事政治社會化的活動，且對下一代而言，由於對政治尚處於理解的階段，在互動的過程中，幾乎都屬於被動的接受，較少有主動表達或選擇的機會，這也與家庭中互動模式究竟是屬於民主或權威有關。台灣地區平均每戶人口數從1990年的4人，2000年則降到3.3人，（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557&ctNode=3272>），家庭結構的改變，加上家庭中主要經濟來源大多由雙親共同負擔，親子間所能相處的時間較為有限，或許能見面的時間都有限，發表意見的機會更可能少之又少，這是造成親子關係改變的原因一。而這對於意見的表達，可能會有影響之外，家長是否尊重孩子的意見，更涉及了民主及權威兩種對等的互動模式，如果民主及權威的態度確實經由家庭而來，家庭民主模式則無疑是個重要的因素。此外，家庭的管教方式，涉及到家庭中父母是傾向於較嚴格式的管教，或是較放任式的管教。個人政治態度與行為，在不同的管教模式下，可能也成為管教的項目。而多數學者的研究都指出，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的互動過程、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態度與行為的形成有關（Capaldi & Patterson 1991; Capsi & Elder 1988; 吳齊殷：2000；侯崇文：2001）。

雖然家庭具有很重要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不過，學校中的各種政治學習，對於政治定向的形成亦具有重要的意義。J. S. Coleman 就認為在家庭之後，學校是基本的政治社會化媒介（Coleman, 1965:22）。R. E. Dawson & S. K. Schwartz 更進一步認為：學校的政治社會化係參與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Dawson & Schwartz, 1975:63）。

在進入學校之後，跟家庭有相當類似的狀況。在學校中，除了跟老師在課堂上的互動有權威或民主之別，校級、班級、社團等相關組織，相較於在家庭中，都屬於較正式的、類似於社會中各項正式的政治組織。因此，在學校生活中，正式上課與老師的互動、以及參與校內各級組織，不但有直接及間接的政治學習，透過各種議題的討論，更存在著有意及無意的學習。

一般而言，討論學校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老師的心態、教學方式、教室風氣、儀式教育內容、學校校風，都是常被提及的焦點（林嘉誠，1987：243）。部分研究將學校政治化環境，定義成所謂的「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也就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課堂討論情況，是過去研究學校對於個人價值與態度形塑的重要面向（陳陸輝、黃信豪，2007：17）。

通常學校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都是利用兩種型態進行：第一就是有意識的政治社會化。第二就是無意識的、偶然的政治社會化（陳文俊，1983：204）。就學校內的環境而言，非計畫性的教室內的氣氛與社團的活動等，亦同樣會有影響，而為學者使用來測度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陳義彥，1979：144-161）。此外，在校討論公共問題的程度，則較接近於學校中非計畫學習內容的部份，各種討論性質場合所面臨的問題，如：是否受到鼓勵或參加這種場合的頻率等。

而台灣自 1990 年代起一連串的教改，除了學術自由的爭取之外，校園民主化更是另一項重點。《大學法》也因此自 2002 年起，有了八次的修訂，加上 2006 年《教育基本法》禁止體罰條款的修正，校園裡師生關係與以往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師生關係間，原來校園裡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也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六八四號解釋，學校對學生各種的行政處分或公權力措施，都可作為行政訴訟的標的後，轉變成對等的關係。

家庭以及學校雖然都有政治訊息傳播的功能，不過，最具全面性的就要屬於大眾傳播媒體，而其在政治社會化上所扮演的角色，Dawson & Prewitt (1977) 就指出主要在增強既有的政治態度，而並非改變政治態度，且最主要的是用來強化政治學習的內容。卓美玲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卓美玲，1998：50-88）。S. Kraus & D. Davis 則歸納有關政治社會化與大眾傳播媒體的研究，得出幾點結論：大眾傳播媒體是政治消息的主要來源；報紙與電視是政治學習中，最主要的大眾傳播媒體，但依年齡及社經地位的不同，使用狀況有別；年輕人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對其政治意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父母對孩童媒體的使用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Kraus & Davis, 1976:25-26）。固然，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有待於與其他政治社會化媒介的配合，但是，長期的暴露於媒體的刺激之下，對於個人政治興趣的增強，提高政治知識與投票率等，卻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存在（Lane, 1959:281-289）。

陳文俊的研究就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經常收看電視新聞者，會增加對權威政治的容忍度，而經常閱讀報紙新聞者，卻會降低對權威政治的容忍度（陳文俊，1997：103）。

張硯筑以台北市公私立大學生為對象的一項研究發現，最常使用的媒介、最主要的政治消息來源或最相信的政治消息來源，電視均居首位。年級、社經地位、學院和媒介使用頻率、政黨認同與報紙類別、性別與主要政治消息來源、政黨認

同與政治信任感、性別與政治信任感均有顯著相關。另外，媒介使用頻率與政治知識具有正向關係（張硯筑，2004：66-100）。

陳義彥的研究則指出，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是一重要因素，接觸電視新聞，與個人對政府的情感有關；喜歡閱讀報紙國際新聞、國內政經消息及社論者，與政治知識、民主信念、政治興趣、參與意識、涉及競選活動等有關（陳義彥，1978：173-174）。陳陸輝、連偉廷則發現，由於媒介型態與其資訊內容傳遞方式的不同，電視的影響力則顯然較報紙等其他媒介來得更為重要（陳陸輝、連偉廷，2008：121-156）。因此，本研究在大眾傳播媒體這個政治社會化媒介，以個人接觸不同大眾傳播媒體的頻率，與接受大眾傳播媒體觀點的程度等來探討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

由於民主價值屬於一種政治態度，而政治態度的取得，則有賴於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的作用。因此，大學生之民主價值取向，在不同世代間如果有顯著的差異，則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應該也有顯著差異。此為本研究第三個假設。此外，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其影響力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變化。此為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

由於家庭、學校及大眾傳播媒體具有種種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機制作用，且家庭是第一個接觸、學校是第一個正式的政治社會化媒介，而大眾傳播媒體則具有全面性的特質，因此，本研究之政治社會化媒介，擬以此三項為主要的分析項目。測量家庭的三個面向為：家庭的政治化、家庭民主模式、家庭的管教方式計由 7 道題目所構成；學校則由兩個面向組成，學校的民主模式與在校討論公共問題的程度，計由 5 道題目所組成；大眾傳播媒體則由 5 道題目所構成，測量政治社會化媒介之題目，請參閱附錄。

個人之背景因素，如性別、社經地位等，在政治相關議題的實證研究上，大多是造成顯著差異的來源（Verba, Schlozman, & Burns, 1997; Jennings, 1998; 劉義周，1994），此外，由於本文研究對象為大學生，其父、母親背景等資料，也屬於其個人之背景因素，因此也納入分析。

肆、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論文所使用資料係「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計畫編號：NSC80-0301-H004-18，計畫主持人為：陳義彥，其它研究參與者為：洪永泰、盛杏媛。「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NSC 89-2414-H-004-048），計畫主持人為：陳義彥，其他研究參與者為：劉義周、盛杏媛、游清鑫、陳陸輝、鄭夙芬、張卿卿、洪永

泰、鄧毓浩、傅恆德、陳文俊，兩項資料釋出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研究母體上，兩次調查皆為台灣地區日間部大學生（除軍警院校外），在抽樣設計上，則採分層多階段等機率抽樣（陳義彥、洪永泰與盛杏媛，1991；陳義彥，2001）。在1991年的調查中，共計完成1,436份有效樣本；2001年則完成1576份有效樣本。1991年調查結果，樣本與母體分配一致；2001年調查中，樣本之性別、年級、抽樣層別分配，與母體不一致，因此，以此三者進行加權，加權後之樣本分配與母體一致。2011年的調查則以東部地區某大學為母體，採多階段等機率抽樣，共計完成50份有效樣本，其樣本與母體分配一致。

在分析策略上，為了要瞭解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因此，採用「多階段區塊遞移因果順序模型」(Multiple-Stage Block Recursive Causal Model)的作法加以分析。此模型係發展自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1960)的「漏斗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並經由Miller & Shanks兩人於The New American Voter一書完成(Miller & Shanks, 1996)。此模型假定，政治偏好是經由長期的演化過程而來，有其相當大的連續性。如就投票的政治偏好來說，人口社會特徵影響政治態度定向，影響政策偏好等，最後形成其投票抉擇。

其作法是將性質相近且因果順序關係不易釐清的自變數放在同一個區塊(Block)；其次，界定不同區塊之間的因果順序(Causal Order)，並且假定，在前一階段(Stage)的區塊變數會以遞移(Recursive)的方式影響後一階段區塊變數的表現。其因果順序的設定原則，主要包括兩類(Davis, 1985:11-16)：第一類，「時間先後原則」。第二類，「相對穩定原則」。John Bartle則指出另外的參考原則(Bartle, 2003:326)，如：「非政治態度先於政治態度原則」、「回溯先於展望原則」、「特殊性先於普遍性原則」。因此，依政治社會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開始作用之時間先後順序(時間先後原則)，本文之分析架構，繪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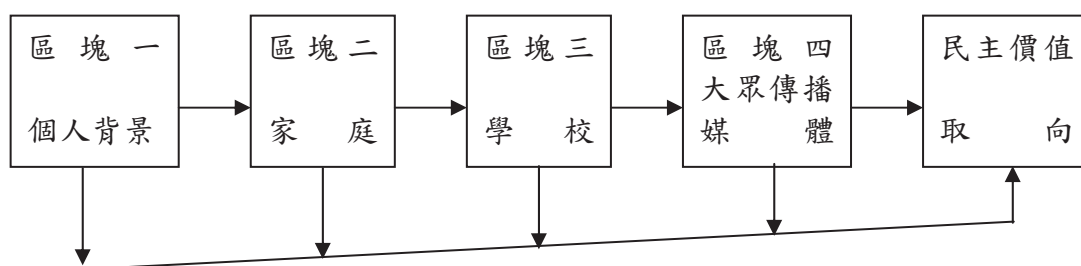


圖 1：分析架構

如果自變數彼此之間係以某種因果順序進行互動並繼而影響依變數，則對於自變數相對影響力之估計，研究者應該將焦點放在「因果效果」(causal effect)上，

此一因果效果包括了「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兩大類 (Davis, 1985)。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在探求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相對影響力之估計，因此，透過統計控制「前置變項」(prior variables)，而不控制「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s)，以求「因果效果」(causal effect) 為主。為了更具體說明此一因果效果之統計控制方式，茲以本文研究架構說明之。

以圖 1 為例，當我們想要估測「家庭」對於民主價值取向所可能產生的因果效果時，依照 Davis (1985) 的看法，我們應該只控制個人背景 (區塊一，前置變項) 即可；至於在家庭之後的其他中介影響變項，如學校、大眾傳播媒體等，則不加以控制。如此所得之效果估計即為「因果效果」，不僅包括了「家庭」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直接影響效果，亦包含了「家庭」透過「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等中介變項所產生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間接影響效果。綜合「家庭」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即為「家庭」對於民主價值取向依變數的「因果效果」。

因此，將測量政治化媒介的題目，各自彙整成「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等綜合性指標，並全部重新調整，使之都介於 0-1 間，以便進行相對影響力之比較。此外，儘管將連續性資料轉化為類別資料，將失去部分資訊，然而，在研究過程中，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以連續性資料及類別資料分別進行分析時，自變項的影響並未因依變項資料轉換而有影響方向上的不同，分成兩組後，有利於自變項影響力的解釋，因此，依民主價值取向平均數將民主價值取向分成高、低兩組進行各項分析。²

伍、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調查結果比較

一、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的比較

整體而言，大學的民主價值取向已經相當高，但經與調查年做卡方檢定後發現，不同年代調查具有顯著差異。1991 年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較高者的比例，高於 2001、2011 年的大學生。詳如表 1。就此一結果而言，與本研究對於民主價值取向有顯著變化的第一個假設相符，但是卻與民主價值取向將逐步提高的第二個假設相反。在民主化實施之後，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反而有降低的傾向，與

² 在將原本 6 個選項的各題目合併、重新分成 2 個選項的過程中，確實會導致部分資訊流失。不過以合併後之 6 選項與 2 選項兩個變數進行分析，兩者呈現高度相關，其 Tau c 值大於 .90，所以，應可接受。

一般對於豐富民主經驗有助於民主價值取向的提升大不相同，這也是本文以民主價值取向作為研究主題的原因之一。

學者陳光輝從民主經驗切入解釋此一現象，他認為此差異是導因於1991年的大學生處於民主化高峰期，受到學運當時社會中民主訴求之影響，因而形塑出較高程度的民主價值。2001年時則處於相對穩定的民主期（陳光輝：2010），2011年則已經歷第2次政黨輪替，民主更加鞏固。就台灣現實政治狀況而言，政治體制民主化的程度，1991年之後，顯然有大幅度的改進。以當時民主化的各項訴求，大致皆已落實的情況而言，關注焦點轉移至實施民主化後所衍生的各種問題，如：公共政策的討論，應該才是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的下降的原因。對照媒體大幅度的開放，資訊的爆炸，政治上由一元而多元化的紛亂，加上各種選舉互相攻擊的新聞充斥版面，則是民主價值取向降低的另一個原因。

表1 調查年與民主價值取向的卡方檢定

			民主價值取向		總和
			低	高	
調查年	1991	n	574	854	1428
		%	40.2	59.8	100.0
	2001	n	1046	528	1574
		%	66.5	33.5	100.0
	2011	n	31	19	50
		%	62.0	38.0	100.0
總和		n	1651	1401	3052
		%	54.1	45.9	100.0

說明： $X^2=209.180$ ， $p<.001$

二、政治社會化媒介的比較

家庭、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這三個政治社會化媒介，在不同的調查年間，除1991年與2011年的家庭無顯著差異外，其餘皆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這符合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以時間點而言，1991年到2011年間，政治環境的變遷朝向民主開放的方向，以家庭與學校這兩個媒介所組成的各個面向而言，家庭民主模式及學校民主模式，無疑受到影響，而與政治環境的變遷方向一致，且幾乎是同時發生。詳如表2。

接觸大眾傳播媒體也具顯著差異，以時間點來看，1991年到2011年之間，大眾傳播媒體最主要的變化，除了越來越開放之外，就是新媒體的出現。其中，尤

其以網際網路的發展最受人矚目。媒體數量的增加，內容的開放與新媒體的出現，是大眾傳播媒體變遷的最主要原因。

表 2 調查年與政治社會化媒體的變異數分析

政治社會化媒介	調查年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ost Hoc test
家庭	1、1991年	.6890(.10382)	9.080***	1>2
	2、2001年	.6760 (.09863)		2<3
	3、2011年	.7275 (.11563)		
學校	1、1991年	.5456 (.11009)	36.442***	1<2
	2、2001年	.5556 (.11351)		2<3
	3、2011年	.7147 (.14070)		1<3
大眾傳播媒體	1、1991年	.7483 (.11069)	371.134***	1>2
	2、2001年	.6192 (.15246)		2>3
	3、2011年	.5676 (.16207)		1>3

說明：P<0.05*，p<0.01**，p<0.001***

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

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民主價值取向，在 1991 年的調查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對於民主價值取向，都有顯著的影響。在 2001 年則僅有學校有顯著影響。2011 年的調查中，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並無顯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證實了部分本研究第四個假設。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力，從有到無之間，確實有了變化。詳如表 3。

表 3 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民主價值取向的變異數分析

政治社會化媒介	民主價值取向	1991年		2001年		2011年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家庭	低	.6874 (.10442)	.240	.6738 (.09885)	1.545	.7243 (.10642)	.058
	高	.6903 (.10300)		.6805 (.09834)		.7333 (.13442)	
學校	低	.5336 (.10243)	10.992***	.5515 (.11173)	3.915*	.7114 (.11915)	.050
	高	.5533 (.11395)		.5636 (.11673)		.7202 (.17372)	
大眾傳播媒體	低	.7216 (.10610)	57.545***	.6166 (.15444)	.968	.5751 (.15912)	.172
	高	.7661 (.11022)		.6246 (.14866)		.5554 (.17045)	

說明：P<0.05*，p<0.01**，p<0.001***

四、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背景與民主價值取向：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

為瞭解各個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之因果效果，並進行不同政治社會化媒介間對民主價值取向之影響力，本研究採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分析。在民主價值取向的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中，依自變項的兩個主要類別，總共分成四個模型，模型1：控制變數；模型2：控制變數+家庭；模型3：控制變數+學校；模型4：控制變數+大眾傳播媒體。

1991年的調查，在4個模型中，除模型2外，模型與資料之間有良好的適和度（Hosmer & Lemeshow test皆大於0.05），模型內所含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具有解釋力（Ominibus test皆小於0.05），此一解釋力大小為0.038-0.095間（Nagelkerke R^2 ）。在預測力部分，「原始」（original）正確預測百分比為59.8-61%，正確預測百分比為62.5-63%。整體來說，除模型2外，其他模型都是尚可被接受的模型。詳如表4。

2001年的調查，在4個模型中，模型與資料之間有良好的適和度（Hosmer & Lemeshow test皆大於0.05），除模型1、4外，其他模型內所含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具有解釋力（Ominibus test皆小於0.05），此一解釋力大小為0.013-0.038間（Nagelkerke R^2 ）。在預測力部分，「原始」（original）正確預測百分比為66.2-66.3%，正確預測百分比為66.3-66.6%。詳如表5。

2011年的調查，在4個模型中，除模型2外，模型與資料之間有良好的適和度（Hosmer & Lemeshow test皆大於0.05），除模型3、4外，其他模型內所含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具有解釋力（Ominibus test皆小於0.05），此一解釋力大小為0.402-0.555間（Nagelkerke R^2 ）。在預測力部分，「原始」（original）正確預測百分比為64.4-64.8%，正確預測百分比為75.6-84.2%。詳如表6。

表4 1991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背景與民主價值取向：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一 (控制變項)		模型二 (控制變項+家庭)		模型三 (控制變項+學校)		模型四 (控制變項+大眾 傳播媒體)	
	B	Exp (B)	B	Exp(B)	B	Exp (B)	B	Exp (B)
男性 (女性=0)	.380**	1.462	.379**	1.461	.345**	1.412	.275*	1.316
年齡	1.505	4.504	1.618	5.042	1.473	4.362	1.316	3.728
年級	.238	1.269	.187	1.206	.194	1.214	.217	1.243
父親-親國民黨	-.539***	.583	-.632***	.531	-.558***	.573	-.618***	.539
父親-兩黨都差不多	-.413*	.662	-.500**	.606	-.415*	.661	-.467**	.627
主觀家庭社經地位	.602	1.825	.296	1.345	.582	1.790	.509	1.663
父親教育程度	.104	1.110	.205	1.228	.119	1.127	.093	1.097
母親教育程度	.074	1.077	-.002	.998	.069	1.072	.082	1.086
家庭			.780	2.181				
學校					1.453*	4.275		
大眾傳播媒體							3.388***	29.610
常數	-1.031	.357	-1.348	.260	-1.740	.176	-3.281**	.038
N	1111		1038		1107		1106	
Ominibus test	.000		.000		.000		.000	
Nagelkerke R ²	.038		.043		.044		.095	
Hosmer & Lemeshow test	.235		.033		.676		.515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original)	59.9		61.0		59.9		59.8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equation)	60.3		60.7		60.3		63.0	

說明：P<0.05*， p<0.01**， p<0.001***

表5 2001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背景與民主價值取向：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一 (控制變項)		模型二 (控制變項+家庭)		模型三 (控制變項+學校)		模型四 (控制變項+大眾 傳播媒體)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男性 (女性=0)	.114	1.121	.101	1.107	.109	1.115	.105	1.110
年齡	2.819	16.755	2.913	18.419	2.903	18.236	2.833	17.002
年級	-.218	.804	-.230	.795	-.213	.808	-.204	.815
父親-親國民黨	.099	1.104	.109	1.115	.099	1.104	.089	1.093
父親-兩黨都差不多	-.032	.969	-.029	.971	-.016	.984	-.041	.960
主觀家庭社經地位	-.600	.549	-.782	.458	-.696	.499	-.610	.543
父親教育程度	.600*	1.822	.611*	1.841	.551*	1.734	.621*	1.861
母親教育程度	-.231	.793	-.181	.834	-.173	.841	-.229	.795
家庭			.803	2.231				
學校					.992*	2.696		
大眾傳播媒體							.238	1.269
常數	-2.289*	.101	-2.818**	.060	-2.846**	.058	-2.456**	.086
N	1524		1499		1518		1520	
Ominibus test	.066		.016		.031		.076	
Nagelkerke R ²	.013		.038		.017		.014	
Hosmer & Lemeshow test	.664		.197		.306		.341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original)	66.2		66.3		66.2		66.2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equation)	66.3		66.6		66.4		66.4	

說明：P<0.05*， p<0.01**， p<0.001***

表6 2011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背景與民主價值取向：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一 (控制變項)		模型二 (控制變項+家庭)		模型三 (控制變項+學校)		模型四(控制變項+ 大眾傳播媒體)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男性 (女性=0)	-1.028	.358	-1.947	.143	-1.033	.356	-1.023	.359
年齡	2.266	9.644	8.790	6569.382	2.231	9.309	2.282	9.797
年級	-3.003	.050	-6.782	.001	-3.050	.047	-2.970	.051
父親-親國民黨	-1.490	.225	-1.162	.313	-1.473	.229	-1.473	.229
父親-兩黨都差不多	-.988	.372	-2.249	.105	-1.025	.359	-1.003	.367
主觀家庭社經地位	-3.771	.023	-9.610	.000	-3.659	.026	-3.744	.024
父親教育程度	6.865*	958.231	5.389	218.910	6.879*	971.522	6.781*	881.165
母親教育程度	2.258	9.564	2.764	15.863	2.180	8.846	2.237	9.365
家庭			.806	2.240				
學校					-.852	.426		
大眾傳播媒體							-.230	.794
常數	-4.553	.011	-3.646	.026	-3.893	.020	-4.383	.012
N	45		38		45		45	
Ominibus test	.049		.021		.074		.076	
Nagelkerke R 2	.402		.555		.404		.402	
Hosmer & Lemeshow test	.507		.034		.666		.678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original)	64.4		65.8		64.4		64.4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equation)	75.6		84.2		77.8		75.6	

說明：P<0.05*， p<0.01**， p<0.001***

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因果效果，1991年的調查，學校、大眾傳播媒體對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是有顯著的差異。2001年的調查則僅有學校有顯著的差異。2011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高低，則無顯著差異。

以1991年的家庭為例，從最低（數值=0）到最高（數值=1）時，其民主價值取向成為高的一組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780(對數發生比(B)(log odds)係數，)，而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2.181倍（發生比變化倍數(Exp(B)) (odds ratio)）。200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803，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2.231倍。201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806，民主價

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2.240倍

1991年調查中的學校，其民主價值取向成為高的一組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1.453，而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4.275倍。200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992，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2.696倍。201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852，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426倍。

1991年調查中的大眾傳播媒體，其民主價值取向成為高的一組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3.388，而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29.610倍。200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238，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1.269倍。2011年的對數發生比會比原本增加-.230，民主價值取向高的發生比則增加為.794倍。

以家庭與學校的比值（ratio of (a) / (b)）來進行分析時，(a)代表學校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b)代表學校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其比值ratio of (a) / (b)即代表家庭對於大學生在民主價值取向高、低的影響程度（和學校做比較），數值如果大於1，則代表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受家庭的影響大於學校；小於1，則代表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受家庭的影響小於學校；等於1，則代表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受家庭與學校的影響相同。

家庭與學校的比值，在1991、2001及2011年調查都小於1，即代表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家庭低於學校；家庭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比值，在1991年小於1，2001年與2011年則大於1，換句話說，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家庭與大眾傳播媒體有較大的變化，相較於大眾傳播媒體，家庭的影響力，呈上升的趨勢。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比值，在1991年小於1，2001年與2011年則大於1，換句話說，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相較於大眾傳播媒體，學校的影響力，呈上升的趨勢。詳如表7。

綜合以上所述，就政治社會化媒介兩兩比較的比值，1991年呈現大眾傳播媒體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大於學校，而學校的影響力又大於家庭。2001年則完全不同於1991年，呈現學校對於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力大於家庭，而家庭的影響力又大於大眾傳播媒體。2011年與2001年則呈現相同的趨勢。這說明了本研究關於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力變化的第四個假設。

綜觀政治社會化媒介的變化，最主要在於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王浩博研究1988-2000年國小社會科教材發現，1989年之後社會科教科書政治社會化的目標有重大的轉變，愛國精神雖然仍受重視，但已轉化成強調重視「民主法治」觀念的培養。1989年之後則增加學生對一般政治學基本知識的了解，擺脫「政治力導向意識型態的束縛」（王浩博，2002：51）。這或許也是台灣之所以從威權體制到2000年政黨輪替，產生此一民主常態的原因之一。學校中的公民教育

主要目的，其實就是在培養一個個的現代人如何成為國家的主人，並透過種種協商合作，共同治理國家，而這正是公民教育政治的一面（高寶華，2005：191-205）。而在這段期間，高中公民教育教材則並無重大變化。對照國小社會科教材之變動時期，正是台灣民主化轉型的高峰期，體罰的禁止、中學髮禁的解除，大學法自1994起，有了2002、2003、2004、2007年等幾次的大幅修正，種種的措施都代表校園的氛圍，與以往截然不同。這也正是學校對民主價值取向影響力變動的主要來源。

一般而言，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社會化所扮演的角色有：加強或改變個人在政治上的行為定向及模式，傳遞政治文化，影響政治參與的積極或消極，擔任政治教育的角色。（林水波，1978）此外，大眾傳播媒體也扮演雙重的角色，提供新的資訊、態度與看法，使民眾具以形成意見的基本的認知，進而做出對事物的判斷。1990年代報禁解除、媒體的開放，對於民主化的發展有一定的助益，而且對於民主化的進展，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然而，大眾傳播媒體的數量急遽增加，則代表資訊大量的增加，充足的資訊固然有助於對政治世界的瞭解，然而過多的資訊，可能反而造成資訊超載的現象。如果再加上網際網路的興起與運用，可能更加深此一現象的影響。

表7 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民主價值取向影響力比值

	家庭/學校	家庭/大眾傳播媒體	學校/大眾傳播媒體
1991年	0.5368	0.2302	0.4289
2001年	0.8095	3.3739	4.1681
2011年	0.9460	3.5043	3.7043

個人背景在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上，有顯著差異者於1991年有：性別、父親政黨認同。2001年與2011年則為：父親的教育程度。黃秀端與趙湘瓊的研究指出，隨著台灣環境的變遷，民主化以及婦運的發展的結果，女性在民主態度與政黨認同上有長足變化，男女的政治態度差距日益縮小，但普遍仍缺乏政治興趣，同樣地，教育程度對於政治態度的影響相當重要（黃秀端與趙湘瓊，1996：71-95）。此一研究結論，與本文兩次調查間，不同性別大學生，由1991年的顯著差異到2001年及2011年的無顯著差異，趨勢相同。

在1967年S. Appleton對臺灣的161位高中生和682位大學生做的調查中，發現美國、香港大學生年級愈高愈支持民主自由價值，而在臺灣則完全相反（朱雲漢，1976：57）。但在本文中，年級別並未有顯著的差異。一般而言，年級越高代表受大學正式教育較長，然而大學教育的內涵，儘管仍有部份通識或共同科

目與民主法治有關，但依科系別各有其專業，反倒才是大學教育的重點。而在非正式的學習上，則與高中教育已有相當高的重疊，如班會、社團活動等。或許因此，年級在大學生的調查才未顯差異。在年齡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上，其差異則因為部分大學生於服完兵役或於就業後再重回校園，其年齡較長，政治社會化過程與大部分學生略有不同所致。

父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間接影響小孩有較高的民主價值取向，一般而言，與教育程度越高，會比較重視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且較能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有關；此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比較有政治的容忍度，及比較豐富的政治知識等特質，這些都有助於發展民主價值的觀念 (Kuenzi, 2005; Rowen, 2007)。而這正是許多現代化研究者所關心的主題之一。此一研究成果，與本文 2001 年及 2011 年調查中，父親教育程度之高低對受訪者民主價值取向之高低有顯著差異，結論相同。

在黨派認同的研究上，林嘉誠研究顯示，民主價值取向較低者，強烈支持國民黨；民主價值取向較高者，較支持無黨籍人士（當時尚未解除黨禁）（林嘉誠，1984,1985,1986）。這項研究，採用受訪者個人的黨派認同所得到的結論，與本文採用父親的黨派認同 1991 年及 2011 年調查所得到的結論一致，不過，卻跟 2001 年的不同。有這樣的結果產生，可能跟調查進行時的背景有關。

1991 年各項民主化的措施正陸續進行，到了 2001 年時，可說大體完備，2011 年則更加鞏固。1991 年時，在野黨急於改變，透過民主的訴求，不但能夠有效的攻擊執政黨，也能有爭取執政的機會。1991 年的調查數字間接證明了此一現象，父親支持執政黨者的受訪者民主價值取向低於父親支持在野黨者。而 2001 年時，由於民主化大致已經完成，也有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換句話說，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都對民主化有了共識，在民主價值取向上的差異性也就消失了。2011 年時，已歷經第二次政黨輪替，由國民黨執政與 1991 年雷同，在民主價值取向上儘管存有差異，但與 2001 年相同，並未達顯著。

陸、結論

本研究透過三次對大學生的調查，並以政治社會化媒介解釋民主價值取向的變化，進行比較研究。在調查年與民主價值取向的卡方分析，發現民主價值取向在不同年代的大學生身上，有顯著的差異。進一步在調查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及個人背景的模型中，發現不同時期大學生之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1991 年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高於 2001 年與 2011 年的大學生，並且有顯著的差異，詳如表 8。

表8 調查年、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背景與民主價值取向：Logistic Regression

	B	Exp (B)
1991年 (2011年=0)	1.695***	5.446
2001年 (2011年=0)	.572	1.773
男性 (女性=0)	.165	1.179
年齡	2.330*	10.275
年級	-.068	.935
父親-親國民黨	-.273**	.761
父親-兩黨都差不多	-.221*	.802
主觀家庭社經地位	-.567	.567
父親教育程度	.499*	1.648
母親教育程度	-.007	.993
家庭	.327	1.387
學校	.894*	2.444
大眾傳播媒體	.728*	2.071
常數	-3.790	.023
N	2555	
Ominibus test	.000	
Nagelkerke R 2	.116	
Hosmer & Lemeshow test	.001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original)	55.4	
% of correctly classified (equation)	64.4	

說明：P<0.05*， p<0.01**， p<0.001***

此外，不同年代間，政治社會化媒介確實有顯著的差異，而且是造成了1991年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高於2001年及2011年大學生的原因之一。其中，以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變化較大，1991年以大眾傳播媒體最具影響力，其次則為學校；2001年及2011年則以學校最具影響力。

而在個人背景上，1991年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因性別、父親政黨認同而有顯著差異。2001年及2011年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則因父親教育程度而有顯著的差異。

此外，民主價值取向的變化除了受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外，調查當時，受訪的大學生正處於民主高峰期（1991）與民主相對穩定期（2001）的差異，則可能是民主價值取向變化的來源一（陳光輝：2010）。民主高峰期時，民主制度逐一完備並實施，然而，在實施過程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以及民意透過民主機制進入決策過程的討論，已取代對抽象民主價值的討論與民主制度的爭取，此時，正逐

步邁進民主相對穩定期。此一關注焦點的轉移，則可能是民主價值取向降低的另一項原因。而 2011 年雖然是小樣本的調查，不過研究結果顯示，1991 年民主化高峰期之後，儘管 2001 年民主價值取向有顯著的下降，但隨著民主化發展的深化，2011 年民主價值取向則呈現略升的趨勢。

穩定的民主價值取向，有助於民主化的實施，但是，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如果持續不斷下降，則令人擔憂台灣的民主前景。因此，實有必要加以持續關注。本研究的對象只針對大學生這一群，就透視整個民主價值取向變遷的了解略顯不足，若長期相同樣本的研究難以達成，或許可以考慮，於同一個時期，針對大學生、高中生、國中生與小學生做相同的研究，不但可能較能明瞭不同時期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與政治社會化效果較確切的形成時期，且同時較能掌握未來變遷的趨勢。

附錄

一、個人背景

個人背景中，父親政黨認同分為：親民進黨、親國民黨、兩黨差不多。

二、民主價值取向

民主價值取向（部分題目之設計，係採反向問法，分數越高，代表該面向的傾向越低，因此，重新反向計分，使資料呈現分數越高，民主價值取向越高）

（一）反權威：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長，國事宜聽從他的決定（分數反算）。為了避免政治的鬥爭，縣、市長不如由中央指派（分數反算）。強有力的領袖較優良的法律更重要（分數反算）。對一件內亂外患的案件，法官在審判時，應該接受行政首長的意見（分數反算）。政黨的相互競爭，只會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分數反算）。政府自然會為人民解決困難，我們人民不必發表太多的意見（分數反算）。

（二）民主基本觀：我認為民主政治是比較好的政體。意見不同的少數人也應有自由表達的機會。每一國民都應有同等的機會來影響政府的決策。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與多數人無關（分數反算）。

（三）自由權：無論一個人的政治觀點為何，都可以公開發表。政府無權限制人民閱讀他所想要看的政治刊物。

（四）制衡權：為了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在野黨。立法院應時時監督行政院，行政院才不會為所欲為。政府如時時受到民意代表的制衡，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分數反算）。

政治社會化媒介之測量，在 2001 年調查與 1991 年調查題目不同時，2001 年的題目列在該題目後方括弧內；而部分 1991 年調查題目的選項與 2001 年調查選項順序相反，或因反向的問法，因此在統計分析前先反向計分。

（一）家庭政治化

題目 1：您父親（或家長）對公共事務的問題（如環境保護、公職人員選舉有沒有興趣？（反向計分）（請問您的父親或母親對於公共事務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有沒有興趣？）

題目 2：您父母（或家長）是否常討論公共事務的問題？

(您的父親或母親是否常與您討論有關公共事務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

題目 3: 您父母(或家長)是否常參加各種公共事務的活動?

(您的父親或母親是否常參加各種與公共事務性有關(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的活動?)

(二) 家庭民主模式

題目 1: 當您小的時候, 您父母買一些屬於您的東西, 他們事前會問您的意見嗎?

題目 2: 當您小的時候, 家中的事您父母會讓您表示意見嗎?(當您小的時候, 您的父母親會讓您對家中的事表示意見嗎?)

(三) 家庭管教方式

而家庭的管教方式是由兩道題目所構成, 題目如下:

題目 1: 您覺得您父親的管教是:(反向計分)(請問您覺得您父親的管教是:)

題目 2: 您覺得您母親的管教是:(反向計分)(那您的母親呢?)

(四) 學校的民主模式

題目 1: 當您不同意老師的意見時, 您可不可以毫無困難向他提出意見?(反向計分)

題目 2: 當您覺得老師對您有不公的處置時, 您可不可以毫無困難的向他提出意見?(反向計分)

(五) 在校討論公共問題的程度

題目 1: 您是否常參加或聆聽學校所舉辦的有關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討論會或辯論會?

題目 2: 在課堂上或下課後, 您的同學常與老師討論一些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嗎?(例如: 選舉、我們的政府、國民黨、民進黨...等)(在課堂上或下課後, 您的老師常與您們討論一些有關政治或公共事務方面的問題嗎?(例如: 選舉、政黨、政府政策、政府領導人風格...等))

題目 3: 您在班上或各種社團會議上是否常發言?

(六) 接觸大眾媒體

題目 1: 您從傳播媒體的報導中獲取政治知識或訊息嗎?

題目 2: 您留意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消息嗎?

題目 3: 您看電視的新聞報導嗎?(您觀看電視的新聞報導嗎?)

題目 4: 您與他人談論的政治話題會引自傳播媒體的報導嗎?

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以我國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為例

題目 5：您留意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消息嗎？（您閱讀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嗎？）

參考書目

- 王浩博(2002)。〈我國國小社會科與政治社會化之研究—12年來之發展的分析(1988-2000)〉，《研習資訊》，19(3)：42-53。
- 朱雲漢(1976)。〈臺灣地區政治文化之研究—近來之研究範圍與發現〉，《人與社會》，4(3)：56-58。
- 何信全(1988)。〈民主與公民文化〉，《中國論壇》，26(10)：19-28。
- 吳乃德(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3：53-85。
- 吳齊殷(2000)。〈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4：51-95。
- 卓美玲(1998)。〈大眾媒體影響台灣政黨政治文化之實証研究〉，《民意研究季刊》，206：50-88。
- 林水波(1978)。〈大眾傳播媒介與政治社會化—傳播模式的角色分析(上)〉，《思與言》，15(5)：28-29。
- 林嘉誠(1984)。〈七十二年選舉行為之研究〉，《政治學報》，12：123-188。
- _____ (1985)。〈政黨支持的因素分析〉，《政治學報》，13：131-167。
- _____ (1986)。〈新生代選民的投票行為〉，《中國政治學會編：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41-277，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 _____ (1987)。〈新生代公民的政治社會化〉，《東吳政治與社會學報》，11：237-271。
- 胡佛(1998)。《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
- 胡佛、陳德禹與朱志宏(1978)。〈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27：3-40。
- 侯崇文(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探討〉，《應用心理學》，11：25-43。
- 袁頌西(1969)。〈政治社會化：政治學中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思與言》，7(4)：19-29。
- _____ (1974)。〈我國家庭政治化與少年政治功效意識之研究(上)〉，《思與言》，11(5)：1-12。
- 高寶華(2005)。〈公民教育與民主政治之關係〉，《北商學報》，8：191-205。
- 陳文俊(1983)。《台灣地區中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台北：財團法人資教中心出版。

- _____ (1997)。《政治社會化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之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出版。
-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台灣民主季刊》，7(4)：1-45。
- 陳伯璋(1988)。〈政治社會與教育—從政治權力的「時」「空」觀談起〉，《中國論壇》，27(4)：18-22。
- 陳陸輝與連偉廷(2008)。〈知性、黨性與資訊—台灣民眾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台灣民主季刊》，5(1)：121-156。
- 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東亞研究》，38(1)：1-48。
- 陳義彥(1978)。〈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文化之研究〉，《政治學報》，7：235-296。
- _____ (1979)。《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台北：作者自印。
- _____ (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NSC 89-2414-H-004-048)。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陳義彥、洪永泰、盛杏澐(1991)。《我國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的態度之變遷》(NSC 80-0301-H004-18)。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台灣民主季刊》，8(2)：99-137。
- 張硯筑(2004)。〈大學生之媒介使用、政治知識與政治信任感之關連—以台北市大學生為例〉，《民意研究季刊》，222：66-100。
- 郭承天(2004)。〈政治民主化〉，陳義彥(編)《政治學》，頁135-157。台北：五南。
- 黃秀端、趙湘瓊(1996)。〈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七十二年及八十一年〉，《問題與研究》，35(10)：71-95。
- 劉義周(1994)。〈政治態度的性別差異—男女有別或男女不平等？〉，《政治學報》，23：133-62。
- Almond, Gabriel A., & Verba, Sidney. (1963).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 Angus, Campbell,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 Donald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Bartle, John. (2003). Partisanship, performances and personaility: Competing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2001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Party Politics*, 9(3), 317-345.
- Beetham, David, Bracking, S., Kearton, I., & Weir, S. (2000).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and Democracy Assessment*.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Beetham, David. (2007). "Towards a Universal Framework for Democracy Assessment." in Michael Saward ed., *Democracy*, Vol. 2 New York: Routledge.
- Capaldi, D. M., & G. R. Patterson(1991). "Relation of Parental Transitions to Boys' Adjustment Problems: I. A Linear Hypothesis. II. Mothers at Risk for Transitions and Unskilled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489-504.
- Caspi, A., & G. H. Elder(1988). "Emergent Family Pattern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Problem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s." In R. A. Hinde & J. Steven-son-Hinde (Eds.),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ies* (pp. 218-2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Steven. H. (1972).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the Family: Implications for Adaptability and Change", paper presented to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James A., (1985). *The Logic of Causal O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 Dawson, Richard E., & Kenneth, Prewitt. (197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 Analytic Study*.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Gasiorowski, Mark J., & Timothy, J. Power. (1998).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the Third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6):740-71.
- Hyman, H.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 James, S. Coleman. (1965).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1998).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Politics*, 60(4):954-73.
- Kuenzi, Michelle. (2005). "The Role of Nonform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Democratic Attitudes: Finding From Senegal." *Democratization*, 12(2):223-44.
- Kraus, S., & Davis, D. (1976).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on Political Behavior*.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ane, Robert E. (1959).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Free Press.
- _____. (1972). *Political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iller, Warren E., & Shanks, J. Merrill.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 Press.
- Mishler, William., & Richard, Rose. (2007). "Generation, Age, and Tim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Learning during Russia's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822-34.
- Prothro, J. W., & Grigg, C. M. (1960).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276-294.
- Przeworski, Adam., &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2):155-83.
- Rowen, Henry S. (2007). "When Will the Chinese People Be Free?"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38-52.
- Schwartz, David C., & Schwartz, Sandra k. (1975).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igel, Roberta. (1965). "Assumption About the Learning of Political Values." *Annal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 1-9.
- Sorensen, Georg. (1998).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Verba, Sidney K., Lehman Schlozman, & Nancy, Burns. (2005). "Family tie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ticipation." In Alan S. Zuckerma (ed.),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p. 95-11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Richard W. (1970). *Learning to Be Chinese :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